

道家思想与汉代史学

王萍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B95
42

此书获“山东大学出版基金委员会”资助

道家思想与汉代史学

王 萍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太生

封面设计/张脉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家思想与汉代史学/王萍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8

ISBN7-5034-1212-7

I. 道… II. 王… III. ①宗教-研究-作品集-中国

②史学-研究-作品集-中国 IV. J212.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99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福利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0001-2000 册

插 页: 2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34-1212-7/G·0418

定 价: 2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序

世界上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有其政治立场、社会历史观点和治史的理念与方法，区别在于，有人对此明白宣示，有人则在其著述中有意或无意地显露。揭示历史学家及其著作与该时代各种思想的联系或者说互动关系，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思潮的勃兴，造就了儒、墨、名、法、道、阴阳等著名的思想学术流派和反映他们思想观念的一批被后人视为传统文化元典的著作。这些思想学术流派经过秦与西汉初年的整合，形成了儒道互补的主流意识形态。两汉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主流意识的影响与支配。学术界对儒学给予史学的影响早就比较关注，因而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对道家给予史学的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虽有涉及但不够深入和系统，因而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就少而零散。有鉴于此，王萍

同志选取了《道家思想与汉代史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以期系统深入地理清道家思想与两汉史学的关系。这篇论文在2000年5月答辩时顺利获得通过，以陈其泰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认为该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代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此后，王萍同志对该论文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从论点的斟酌，资料的调整与补充，到行文的润色，与原文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观。

这部书稿以两条线索贯串始终。一条线索是从先秦到两汉道家思想的发展变化，清晰地展示其随时代的转换而发展变异的脉络。一条线索是道家思想对不同时代的史学和史学家的影响，探索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道家思想对史学影响的表征及规律，竭力寻觅道家思想在司马迁、刘向刘歆父子、班固和荀悦等治史活动中的个性化表现，展示了两条线索互为因果，互相交融，互相置换，互相激荡的规律。其创意在此，精萃在此，价值尤在此。面对历史，历史学家必须冷峻、沉潜、理性地思考，以期得出的结论尽量客观、公正、科学，经得起史料和时间的检验。然而，历史学家毕竟又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往往在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中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来。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的著者对道家是充溢着钦佩、激赏和挚爱的感情的。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对道家思想给予两汉史学影响的估价有过头之嫌。纵

使如此，从总体上看，本书所阐述的建立在坚实史料基础上的学术观点是能够立得起来的。作为史学史研究的一部新著，它肯定会给后学以知识和启迪。

孟祥才

2002年8月1日于山东大学

前 言

两汉时期，中国传统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又是与道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密切关联、相伴而行的。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荀悦等史家的史学活动，《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的相继推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启示和影响，并折射出道家思想在汉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另一方面，汉代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日趋深化和不断完善，也往往得益于史家的努力，得益于史学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我们研究汉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对此应该有所关注，有所探究。

—

众所周知，道家思想源远流长，并与儒家思想及其他各家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相互补充，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体脉络和主要线索。不仅如此，

就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实际影响而言，道家及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道教似乎更胜一筹。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①按之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陈先生所言极是。

道家学说从一开始出现，就与史学结下了一种不解之缘。由巫祝分化、演变而来的史官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形成史官文化，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做过春秋时期周王室史官的老子就是中国早期史官的代表人物。本于探求天道、关心自然、沟通天人的史官文化传统，老子对以往的天道观进行改造和深化，剔除其中的神意内容和神秘色彩，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运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提出了天道自然的思想观念，并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和发挥。古代史官在职掌天道的过程中，认识到自然和社会现象不断运动、变化的特点。老子对此加以高度概括和提炼，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而这又往往成为后世史家记述历史轨迹、总结历史规律的重要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古代史官的一个主要职责是为君主记录言行、提供历史资鉴。正是以此为本，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又成为“历记成败、存亡、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3页。

② 《老子》第二十五章。

祸福、古今之道”的“君人南面之术”^①，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主张。后世史家亦颇得其沾溉。另外，老子“见素抱朴”^②的观念，也往往成为后世史家秉笔直书的一个思想源泉。老子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在中国哲学和历史学方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使道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史学开始了相伴而行的历程。^③

老子之后，道家学派大体演变、发展为庄子之学和黄老之学两大系统。前者以隐逸为特点，后者则主张接近并参与政治，但它们都对史学发展有所启示和影响。庄子高扬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倡导的“法天贵真”^④，成为后世史家克服困难、不计得失、义无反顾地撰写历史实录的精神动力。庄子对违反人性的社会黑暗现象的充分揭露，对宗法等等级制度的有力批判，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和异端性格，也不同程度地得到正直史家的认同和承接。庄子为文，汪洋自恣，飘忽灵动，壮阔神奇，仪态万方，怡然自得，体现了哲理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这种文章风格，亦对不少史家有所濡染，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司马迁。宗守老子之说而又融摄儒、墨、名、法诸家学说的道家黄老学派，则成为后世史家著史时发扬包容精神和超越意识的一个典范。

① 《汉书·艺文志》。

② 《老子》第十九章。

③ 参见拙作《老子与中国早期史官》，载《文史哲》2000年第2期。

④ 《庄子·渔父》。

另外，黄老学派对黄帝的依托、推崇，也促使史家著史记事起自黄帝，尊奉其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从而影响中国传统史学既深且远。总起来看，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道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天地人一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表现在其辩证法思想，表现在其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表现在其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表现在其“见素抱朴”、“法天贵真”的求真求实观念，表现在其兼容并包、综合超越的学术旨趣和风格，等等。这些方面，在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都有着不同程度、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表现，并与儒家等学派对史学的影响交织融会在一起。

两汉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涌现出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荀悦等一大批优秀史家，《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相继问世，从而奠定了此后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大体走势。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又总是闪动着道家思想的身影。我们研究两汉史学以及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然而，遗憾的是，古往今来，有关道家学说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包括道家思想对古代社会许多方面的启示和影响，涉及政治、文学、艺术、科技及民族心理和性格等等。然而道家学说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启示和影响等问题却被忽视。与道家思想史的研究一样，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这一领域，关于诸子百

家思想对史学的启示、影响，人们往往偏重儒家，关心诸如《儒学与中国史学》等课题的研究和论著的撰写，却同样忽略了道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联。虽然以往在有关某一史家（如司马迁）的论述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但系统、全面的论著迄今尚未问世。

出现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充分注意史学史与思想史、哲学史等研究领域的相互联系和渗透。近读陈其泰先生的有关论述，觉得颇有教益。陈先生说：“以记载过去的人类活动为对象的历史学，它跟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着多向性的联系，它跟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社会思潮尤其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这就是历史学内涵丰富的综合性的特点。可是，以往长时期内我们对历史学的看法，却是基本上局限于单科性的狭隘范围之内，未能重视它与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的密切联系。造成这种状况，重要原因之一是近代以来过分强调学科门类的划分，不注重学科之间的互相联系、贯通。近代以来各个学科门类的出现和明确划分，固然是认识史上的巨大进步，促使了各门学科趋于精密和系统化。然而，毋庸讳言，过分强调学科之间的界限，便削弱了学科之间本身固有的联系，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对于历史学来说，忽视一部优秀史著的产生与当时社会思潮、文化走向的关系，更会严重障碍我们揭示出这部优秀史著的灵魂，捉住书

中跳动的时代的脉搏。”^①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谈到文化走向、社会思潮时，应该注意儒家、道家等诸子各家学说的作用和影响，而道家思想与汉代史学的相互关联更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二

汉兴以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成为刘汉皇朝的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同时，秦亡教训使最高统治者意识到，单靠严刑苛法那一套高压手段来统御天下是行不通的。于是，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道家黄老之学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兴盛于世，并成为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成为最高统治者治国安民的理论依据。陆贾、贾谊、韩婴等人的思想理论中不仅有儒家之说，而且也有明显的道家思想因素。陆贾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拓展为依道而治的政治理念，并将无为看作道的最高品格，力倡无为而治。贾谊继承、发挥老子和道家的道论，并本于其辩证法思想，强调社会历史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规律，而他倡导为政宽缓不苛、君臣相安无事、民间尚约贵俭，也是以道家思想为准的。韩婴则将道家天道自然的思想更好地贯彻到社会人生领域。以老子和道家之说为宗的《淮南子》的问世，使道家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使其有了更强的现实意义。它特别强调君主自

^① 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而这种修养的原则又是要清静无为，公正廉洁，不烦扰百姓。被后世奉为儒者宗的董仲舒，其主逸臣劳、阴阳刑德等理论学说，也与黄老之学有不少相同、相通之处。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学术生涯更是充满道家色彩，所撰《论六家要指》特别推崇道家。时代风尚和家学渊源都对早年的司马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道家老子、庄子及慎到、田骈、环渊等人的活动，还记载了从河上丈人到盖公的黄老之学的师承渊源。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曾将自己的著史宗旨明确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他在贯彻这一宗旨撰著《史记》的过程中，又表现出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在“究天人之际”时，司马迁以道家的天道自然观为宗镜，主张顺应自然、顺天而动，强调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扬弃了神秘主义的天道观。他还继承、发挥道家的辩证法思想，致力于“通古今之变”，力求记述、探究人类历史变化、发展的轨迹和规律。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这又是与道家的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和抱朴守真思想的启示、影响分不开的。在社会政治观、人生理想观以及文章风格等方面，司马迁也颇得道家思想之沾溉。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后处于在野地位的道家思想依然以支流或暗流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道家学说处柔守雌、超然物外的思想倾向，也往往成为失意士人心

理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依托，引起他们的共鸣。另外，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许多士人将目光转向诸子之学，其中相当一批士人追慕、向往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试图搬出道家学说作为救世良方。严遵著《老子指归》，继承、发挥《老子》之说，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和辩证法思想。扬雄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对道家思想多有融摄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中，刘向、刘歆父子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刘向、刘歆父子的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是在借鉴、吸收诸子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道家思想在其中又占有重要地位。刘向曾著有《说老子》一书，表现出对老子和道家之说的特殊兴趣。刘向要求则天顺时，强调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这与道家的天道自然观和辩证法思想有着某种相同、相通之处。刘向对道家无为而治、崇俭抑奢、戒骄重谦等思想也多有推崇、吸纳和改造，力图更好地运用道家学说这一“君人南面之术”来为刘汉皇朝服务。在领校群书过程中，刘向整理了许多道家著作，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明确提出道家出于史官的学术观点。本于道家的抱朴守真思想和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刘向盛赞并弘扬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在校书撰史时注意求真求实、秉笔直书。刘向对各种旧说的兼收并蓄，也或隐或显地体现了对道家特别是黄老学派

包容性、超越性学术风格的继承和发挥。在刘歆的政治和学术活动中，也不时闪动着道家思想的影子。

东汉前期，在儒家经学和谶纬神学盛行的同时，道家学说继续传布，并契合于最高统治者以柔道理天下的治国方略。强烈反对谶纬神学的桓谭颇重道家之说，曾将老子的道与伏羲的易、孔子的元、扬雄的玄并列，备加推崇。他还认同那种《老子》过于五经的说法，并对道家思想多有吸收。王充也在道家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思想主张虽“违儒家之说”，但却“合黄老之义”^①。王充将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与元气说结合起来，推出了元气自然论。对于道家的自然无为理论，王充也有所继承、改造和发展。当时研究、传播道家学说的士人还有不少。班固之父班彪特别是班彪从兄班嗣，其言行中就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道家思想因素。据《汉书·叙传》记载，班固之父班彪，“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桓谭曾向班嗣借阅《庄子》，班嗣却回信说：“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不结圣人之网，不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谊之羁绊，击名

^① 《论衡·自然》。

声之缰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攀。既击率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眩曜？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①前面说过，桓谭的学说中也有不少道家的因素，但在班嗣看来，桓谭以儒术为宗，故而有意讥讽和回绝，可见其对老庄思想之沉迷。而《叙传》记班彪“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班嗣的影响存在。《后汉书·班彪传》亦称：“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残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唐代李贤注曰：“彪当中兴之初，时运未泰，故不以贫贱为耻，何守道清静之固也！恬淡犹清静也。”再者，班彪曾作《览海赋》，表示自己很愿意与传说中的列仙一起畅游太空：“愿结旅而自托，因离世而高游。”在《北征赋》中，他也提到：“行止屈申，与时息兮。”由此可以看出，班彪为人行事，虽不悖所谓“有道之士”之所守，但“守道恬淡”又确实体现了老庄知止知足、清静寡欲、随遇而安的精神。《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②“祸莫大于不知足，咎

① 《汉书·叙传》。

② 《老子》第十六章。

莫大于欲得。”^① “知止不殆，可以长久。”^② 班彪的言行与此是颇为相通的。班彪还明确说过：“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③ 而在极重家学传统的东汉，这对班固自然会有所濡染。

作为儒学正统史家典型的班固，其著史虽以尊儒颂汉为主要宗旨和基本取向，但又“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④。而且班固承于《七略》明确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⑤ 从《汉书》的撰写中也不难看出道家思想的影子。班固博通天人，注意取资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他强调“通古今”^⑥，“备温故知新之义”^⑦，力求通过具体史实展示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这是与道家的辩证法思想相一致的。对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⑧的实录精神，班固倾心折服，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贯彻到著史活动中。而此举又隐约反映出道家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抱朴守真思想的影响。此外，从班固

① 《老子》第四十四章。

② 《老子》第四十六章。

③ 《后汉书·班彪传》。

④ 《后汉书·班固传》。

⑤ 《汉书·艺文志》。

⑥ 《汉书·叙传》。

⑦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⑧ 《汉书·司马迁传》。